

# 南海知县杜凤治过年时忙什么？

□邱捷

在清代，春节称为元旦、新年，同今日一样，除夕前几天到第二年元宵节，都算“过年”的时间。晚清浙江人杜凤治(1814—1883)，曾两任南海知县，在广州过了五年。他的日记，为晚清官员如何在广州过年，留下了不少生动有趣的记录。

## 典礼、祭祀、给上司拜年

清代有“封印”制度，在十二月下旬交界的某日开始(各年不尽相同)，各级官员的印信都“封存”一个月，征粮、审案、公文往来等日常工作停止，各衙门处于半休眠状态，等于为官员们放一个月的年假。然而，杜凤治是南海知县——清代“南海县”为广州府“附郭县”，县治设在广州城内，与“番禺县”分治府城，合称“首县”——有直接管治广州城的权贵，日常公务虽然暂停，但他还是忙得不可开交。

历朝历代都重视典礼和祭祀，以彰显王朝的正统性和统治秩序。两广总督瑞麟定下每年“元辰卯刻”(年初一清早5时)在万寿宫举行朝贺礼，杜凤治必须最早到。所以，除夕与家人守岁后他只打了个盹，“寅初”(凌晨3时)就冒寒打灯笼乘轿出门赶赴万寿宫。天还没亮，两广总督、广州将军、广东巡抚就率领文武官员对代表皇帝的龙牌行三跪九叩大礼，礼毕，再同去圣庙(祭孔子)、文昌宫(祭文昌帝君)、武庙(祭关、岳)拜祭。年初二，官员们到天后宫、城隍庙、龙王庙拜祭，杜凤治“真正”(凌晨4时)就要出门。元宵节，各官除了按惯例到各庙宇行香外，还要到天后宫打灯，杜凤治同样要提前到达张罗一切。

年初一的典礼、祭祀完毕后，杜凤治就与一干文武官员到总督、巡抚、广州将军等高官衙署拜年，然后到布政使、按察使、盐运使、粮道等上司衙门拜年。到上司衙门拜年，体现了官场的上下尊卑，谁也不敢忽略这项礼仪。其间，杜凤治和番禺知县还得为各官准备一餐酒宴。给主要的上司拜年后，杜凤治就回到南海县署，轮到自己当上司接受下属县丞、巡检等芝麻官的拜年了。热闹一番已接近申时(15时)，他已疲惫不堪，但

稍作休息又出门去给其他上司拜年。

正月间，省城以外的地方官也会专程到广州给督抚等高官拜年。这些官员给高官拜年后，少不得要与首县知县杜凤治有所应酬。如肇罗道员方濬师当过杜凤治的上司，对杜还有推举之恩，他到了广州，杜凤治就要到他的住处拜年。

## 同僚亲友拜年、酒宴、戏宴

拜年是官场编织、维系关系网的重要手段。年初二以后多日，杜凤治或出门给同僚、各衙署幕客拜年，或在家接待拜年者。杜凤治去拜年，有的是“登堂”，即进入房屋内拜，对地位高的、交情深的、官场上用得着的人就必须“登堂”。交情浅或地位一般者，杜凤治到了住宅门口，留下拜帖就离去。来拜年者，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“登堂”，杜凤治就衣冠整齐出迎接待。对某些不是非见不可的拜年者，杜凤治会让门房说主人不在家，拜年者当然知道是假话，但也会识趣地留下拜帖就离去。同治十一年年初二，总督瑞麟自来南海县署拜年，没有“登堂”，只是留下拜帖。但杜凤治稍迟即出门到督署“缴帖谢步”，缴帖即把总督的拜年帖子奉还，表示不敢当；谢步则是同时送上感谢总督大人光临的拜帖。

过年期间官场彼此纷纷请酒宴、请看戏。总督瑞麟定下每年正月十三广州的文武官员团拜，并举办戏宴。原先团拜的戏宴在大佛寺举行，瑞麟后来觉得大佛寺闲人太多，且担心万一火灾不易疏散，把地点改在新成立的炮局(负责铸造大炮)。官员团拜由南海、番禺两首县知县筹办，费用由中下级官员凑集，高官不用出。但凑集的费用肯定不够开销，南海、番禺知县要补贴几百两银。因为省城的戏班都归南海知县管，所以杜凤治出力更多。过年是戏班最忙最赚钱的时段，为官府演出的报酬不及民间演出的一半，更远低于赴香港演出，但戏班只能听从知县大老爷的吩咐，低价为官员们演出。总督、巡抚、粤海关监督等官员往往也在元宵节前后私人举办戏宴，杜凤治无不要参与筹办，经常搞到筋疲力尽。

杜凤治过年时同亲属、亲戚的相处时间反不如平民百姓多。杜凤治在年初二到岳母家拜年，亲戚来拜年的，往往只能寒暄两句，有时就由太太、儿子接待。几年的日记都写了除夕时家祭、与家人在县衙度岁，但对过年时家里的饮食、购物等没有多少记述。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日，杜凤治买了8盆牡丹花，共88朵，价格是每朵2钱8分银，共花费白银22两多(本银24.6两，可能打了折)，其中4盆送给自己的科举同年，广东学政章盛。当时400两银就可以购买广州西关的一处铺屋，与房价比较，牡丹花简直是天价了。

## 过年期间的公务

“封印”期间，多数官员只是忙于应酬，杜凤治却还有很多必须履行的公务。过年前后，盗匪的活动特别猖獗。年前杜凤治常要去辖境的街道“查夜”。因为白天还有大量应酬和公务，“查夜”无疑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公务。

其时广州房屋多为砖木结构，容易失火，冬天更甚。日记记下，同治十二年(1873)正月广州发生两次火灾，当年十二月二十以及光绪三年(1877)除夕也有火灾。但凡有火灾，杜凤治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火场，监督救火和防范趁火打劫。如同治十二年年初二亥正二刻(22时30分)，西关外新填地失火，延烧房屋约五六十间，把沙面的桥也烧毁了。杜凤治闻讯即带差勇及救火水龙飞速驰往，大批文官官员也先后来。到下半夜大火才熄灭，杜凤治疲乏到不能支持，只好嘱咐南海县丞继续维持火场秩序，自己回县署休息。

在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，每年广州都处决上千人，杜凤治都要充当监刑官。死囚一般在过年前处决，但也有例外，同治十三年正月初十，共处决了44名犯人，杜凤治和番禺知县到珠江(今珠江)南侧“杀人地”刑场监刑后，一起到华光庙烧香解秽。

两首县在年前还要给省城各高官致送油、米等物品。这是广东官场特有的惯例。给高官送油、米完全是锦上添花，但其

时广州城还有很多无缺无差的穷官，年关难过。各年年前都有穷官或致函、或亲到向杜凤治借银，所谓借，多数都不会归还，杜凤治为应付这些借银穷官颇费心思，但有时仍不得不借出或赠予一些。为了让穷官能过年，两广总督瑞麟每年从“闰姓”赌税中提拨若干银两，又令南海、番禺两县捐银300两，在十二月下旬对穷官发放一次性救济。穷官分为极贫、次贫、又次贫几个等级，在广州知府衙署发放救济银。因穷官人数多又不顾体面，发放时往往人多论少，不穷而冒领者也有。所以，南海、番禺两首县知县都要到府衙监督发放。

清朝各级地方官府都对上司负责，间接也对朝廷负责，并无今日“公共服务”的观念，也没有这方面的职能和经费。广州一般平民如何过年，杜凤治无须多管，日记也没有记。不过，在年前官府也有惠及孤苦残疾者的零星措施。如年前的“放瞽目”，即对失明者发放一点钱文。“放瞽目”的地点在育贤坊(今禺山路)武帝庙，每名“瞽目”发放铜钱600文，先发牌，再凭牌领钱。600文当日大约可买40斤米。同治十一年有3600位失明人来领取，同治十二年有4400多位。此前“放瞽目”时因拥挤、抢夺而发生踩死人的事故，杜凤治提前五日就发出告示，发放日又派出多名低级官员与衙役维持秩序，所以，几次发放尚算平安顺利。有失明儿童牌子被人抢走，放声大哭，杜凤治查明后就命补发牌子，让他领到600文。有些发放完毕才赶到失明人苦苦哀求，杜凤治就命对超过时间才到者减半发给300文。

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天气极其寒冷，官员、书吏、衙役忙于过年，全不顾及囚犯死活，几天内南海番禺冻饿而死者12人。杜凤治知道后才命发放棉袄百余件，每日放粥一餐，但每日一粥也只能让囚犯在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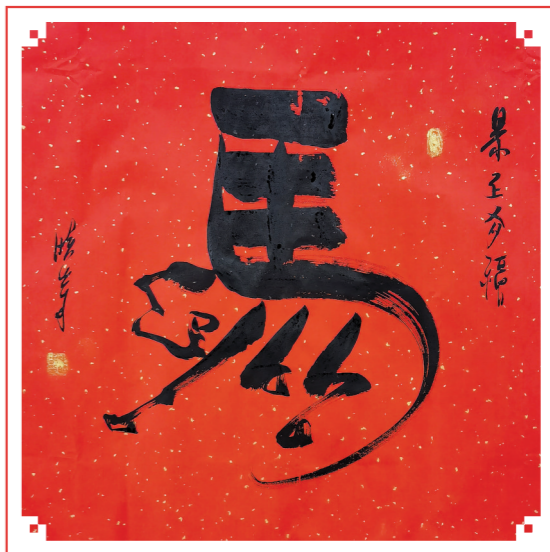
冬中苟延残喘而已。

## 同治十二年的“春色抬揭”

晚清广州没有特地为过年而举办的全社会参与的节庆活动，但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的迎春“春色抬揭”(化装大巡游)，虽是为迎春而举办(正月初七子刻立春)，也为当年的过年增加了喜庆色彩。据说咸丰以前每年立春都举办，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后停办。同治十一年，广州知府冯端本认为，“现在年丰民安”，宜恢复迎春“春色抬揭”，决定由南海、番禺两首县知县出面与各行业的行头商量筹备，仅南海各行就制作了“抬揭”32台。杜凤治正月初六的日记为“春色抬揭”写了约2200字。南海县衙也出动了几百名衙役参与，其中“有藤牌手四十名，俱袒右臂持刀，左手持牌，其臂肥且白粗如栲栳”。日记称沿途观看者有百万人之多，“先日刻卖经过路程单，经过之地，两边房屋无不租赁与人搭台观看，男妇杂沓，举国若狂，竟有一楼房租十余洋银者”。巡游从南海县署出发，到番禺县署，再经府署、学院、臬署、抚署、督署，出督署后又绕行到各司道衙门，由东向西行再次进入督署，总督瑞麟在仪门外坐着。最后，巡游队伍出大东门到演武场，然后祭祀芒神(大岁神)。

同治十二年也是双春年，当年十二月十八立春，前一日也再次举办“春色抬揭”，日记也为这年第二次“春色抬揭”记了约1600字。民俗学家、广东社科院研究员陈忠烈先生赐告：杜凤治笔下的“春色抬揭”，即岭南飘色。《杜凤治日记》的相关记载，是目前可见的对广东“出色”(包括地色、柜色、飘色等抬揭项目)最早的实况记录。

(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

甘肃籍书画家毛晓春的金石书法(马)

# 贬谪文人的春节

□许锋

张九龄的北方岁月，是努力融入帝国核心、实现“致君尧舜”理想的过程。他在《感遇》之一中，以“江南有丹橘”自喻：

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。  
岂伊气候暖，自有岁寒心。  
可以荐嘉客，奈何阻重深。  
运命唯所遇，循环不可寻。  
徒言树桃李，此木岂无阴？  
“经冬犹绿林”是对岭南风物的特性描绘，也是对自己坚韧品格的宣示。

公元716年，张九龄因与幕僚不合，请假“南还”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不诤词多忤，无容礼益辜。微生尚何有，远迹固其宜。”感慨以自己刚正不阿的性格，难容于官场倾轧，不如归乡休养。

张九龄归乡后并未闲居，他“富贵不忘故乡”，首先牵挂的便是大庾岭的交通。大庾岭在哪里？它是五岭(又称南岭)之一，横亘于湖南、广西、江西、广东交界处。南岭虽与北岭(秦岭)并称，但山势平缓许多。大庾岭中间有很多关隘，如梅岭隘，海拔不过几百米，自古为南北往来的孔道。具体而言，大庾岭在今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交界处。

张九龄早年赴举往返，他可能曾亲历此路艰险，山大沟深，悬崖峭壁，路难走，车难行，行人无不胆战心惊。

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成事，张九龄遂上奏玄宗，力陈开凿大庾岭路之利：一旦路通，则“海外诸国，日以通商”，可将岭南“齿革羽毛之股，鱼盐蜃蛤之利”便利地运抵中原，实现“上足以备府库之用，下足以贍江淮之求”，于国于民皆有裨益。玄宗深以为然，下诏恢复张九龄上拾遗内供奉职，并委任其为修路使，督修大庾岭路。

这虽是苦差事，但于张九龄而言，却是“赋闲”后践行抱负的契机。接到诏令后，张九龄立刻亲往大庾岭勘察。这年冬天，张九龄组织工匠、民夫开始修路。他的心情是“饮冰载怀”，非常焦急。为此，“执艺是度”，不当甩手掌柜，“缘磴道，披灌丛”，爬上爬下，披荆斩棘，亲自测量督阵。

“岁已农闲，人斯子来。”南方的十一月，不完全是农闲之时，但由于组织工作得力，父子兄弟齐上阵的景象让张九龄看到了希望。

经官府和民众同心协力，修路任务提前完成。新修的梅岭之道路宽得可并行几辆马车，物资转运事半功倍，行人再无高崖深谷之虞。

这条路很快彰显成效：古道之上商旅络绎不绝，客棧、饭庄、茶房、酒肆次第呈现。更重要的是，南北文化得以交融——在此之前北方人视粤语为“鸟语”，需要经过“九译”才能沟通，岭南则被斥为“南蛮

## 编者按

丙午马年已至，岭南早春，草木葱茏。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特别策划“古人如何过春节”专题，呈现两种不一样的年景：邱捷教授据杜凤治日记，铺陈晚清广州岁时图卷——典礼祭祀、拜贺应酬、查夜救火，于繁礼与奔走之间，见官府运作与市井人情；许锋教授则循唐宋诗文，写韩愈、张九龄、苏轼谪宦之途，在山海风物之中寄怀新岁，以文章自立其心。而史之旁，文思之远，都是历史深处的回响。值此新春，愿诸君策马向前，纵辔驰远，山河为开。

专题策划：温建敏  
专题执行：潘玮倩

年，年年要过。人心所盼，众望所归。但在中国春节历史上，总有一些人恰在年节之际流落他乡，如韩愈、张九龄、苏轼。三位曾在王朝心脏任职，后又远谪岭南，却如三道“特立独行”的微粒，照亮了南北地理与文化的通途。他们的笔端既凝结对长安、洛阳上元灯火、宫廷年仪的记忆，又浸润岭南风情。这种跨越地域和时空的生命体验，既让他们的诗文超越单纯的节令记录，也在无形中参与了岭南春节文化的塑造与融合。

## 韩愈：风雪蓝关与文明拓荒

公元804年春节，韩愈没能在长安过，他去了清远的阳山。公元819年春节，倒是在长安过的，可那年皇帝迎春佛骨，长安陷入宗教狂热，大街小巷全无寻常年节的喜庆。韩愈愤懑不过，按捺不住，写下《论佛骨表》，由此闯下大祸。可以说，他过了春节，但没过上一个“正常”的年。“年关”，真是一道关。长安上空正飘舞着漫天雪花，人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听到了来自朝堂之上的“雷霆之怒”，也为大才子韩愈的命运深深担忧。

“朝为青云士，暮作白首囚”。韩愈没料到，十几年前的境遇不幸重演。他这样一个人，以“正月十四日”奔驰上道，再次从长安的庙堂骤然跌入南下的险途，其间的剧烈反差，如何不构成他笔下最悲怆的“年关诗”？

韩愈行至陕西蓝田关时，侄孙韩湘赶来送行，催生了那首千古绝唱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。  
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。  
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  
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

韩愈以秦岭的巍峨阻隔与蓝关的风雪羁绊，具象了被迫离开政治文化中心的巨怛与前途未卜的迷茫。这风雪，是自然气候，更是政治寒流，是一个忠谏者被抛出所谓家国温暖的极致象征。

数月间，韩愈“经涉岭海，水陆万里”，终“以今月(四月)二十五日到州上谪”。已是春夏。年节早已过去。岭南的湿瘴疠成为韩愈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在《潮州刺史谢上表》中，他描述此地“飓风鳄鱼，患祸不测；岭南近界，涨海连天；毒雾瘴氛，日夕发作”。但是，作为地方长官，他献给百姓的“见面礼”却比任何年货都实在。

首先是祛除“旧俗”的象征性行动“驱鳄鱼”。他亲撰《祭鳄鱼文》，设坛祭祀，以刺史之威与儒家之理，宣示文明秩序对蛮荒自然的征服。此举虽类乎巫祝，

却在心理层面极大安抚了民心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中原礼教权威。

其次，是兴文教。他捐出俸禄，恢复久废的州学，聘请贤士为师，教化士民。在《潮州请置乡校牒》中，他指出：“夫欲用德礼，未有不由学校弟子者。”将中原科举制度、儒家经典系统引入，为潮州打开通向文化主流的大门。自此，潮州文风渐开，后世受益无穷。

韩愈在潮州待的时间很短。按照他在《袁州刺史谢上表》中言：“去年十月二十四日，按例酌情调整，改任为袁州刺史，于本月八日到任”，不过半年时间。但其对潮州深远的影响，令“潮州山水皆姓韩”，是对他至高无上的怀念与礼赞。1092年，苏轼撰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云：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……能信于南海之民，庙食百世”，予以褒扬。

公元820年闰正月初八，韩愈抵达袁州。那么，这一年的春节他是边走边过的，可能在岭南，也可能在江西。此次是“北归”，他心情应该不错，或许会想起自己写的那首过年诗《春雪》：

新年都未有芳华，二月初惊见草芽。  
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

而南方此时早已草木扶疏，完全是春天的境况。

其实，韩愈被贬阳山时写过一首《梨花下赠刘师命》：

洛阳城外清明节，百花寥落梨花发。  
今日相逢瘴海头，共惊烂漫开正月。

岭南的正月，山花烂漫，给韩愈带来很大震撼。

由于工作和生活时间“不搭界”，韩愈似无记录潮州年俗的诗歌，但是他所推崇和奠定的尊师重教、礼义有序等道德规范，又何尝不是春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薪火愈盛的土壤？

## 张九龄：江南丹橘与岭南风度

与韩愈骤然南贬不同，“尚直”者张九龄的人生是一场从南向北的奋力登攀，后又被迫南返的旅程。他的春节心境非关具体的节庆活动，而是更深层地交织着地域身份的自觉、政治理想的沉浮，以及在南北风物比照中透出的更为含蓄且恒久的感伤。

张九龄生于唐代韶州曲江(今广东韶关)一个官宦世家，自幼聪敏，少即善文，曾给广州刺史写信，刺史阅后大加赞赏，“此子必能致远”。张九龄果然不负众望，二十余岁即中进士，之后仕途较为顺达，直至官拜宰相。

